

■新作聚焦

衣向东长篇小说《向日葵》：英雄精神的民间书写

□王必胜

衣向东的长篇小说《向日葵》(时代文艺出版社2014年4月出版)描写了胶东抗战中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抗战艰难的1940年前后,一支八路军兵工厂的人马在烟台栖霞一带为部队制造武器供给,白手起家,九死一生,转战于与敌伪日寇的正面冲突中。他们利用有限的条件,制造出了牙山火炮和仿捷克式步枪,有力地支援了前线。小说描写了这支兵工厂英勇卓绝的战斗历程和参加者们的英雄气概。在最后一场遭遇战——烟台樱桃沟阻击战中,他们为了掩护和转移群众,面对五千装备精良的日伪军,终因实力悬殊,除了带领群众转移的人员外,战斗在前线的官兵洒尽了最后一滴鲜血。他们是:厂长周海阔、技术员白玉山、战士工人王木林以及借用八路军中的国民党军人江南春。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们或引爆炸弹,或与敌人拼杀,或献身悬崖,其壮举义薄云天,其忠魂可昭日月。

小说书写悲剧,步步深入,令人唏嘘。作品以殉难者的壮举,讴歌了抗战英雄不屈的精神。其故事并不复杂,人物也不多,情节设置较为集中地展示了3条线索:一是胶东兵工厂,以周海阔厂长为首,带领一队人马按上级指示为前线部队制造武器。虽不断受到敌伪侵扰,辗转奔袭,却克服种种困难,千方百计地完成任务。二是为了制造出火力强大的枪炮,兵工厂从民间高人中得到了一手技艺的白玉山,为了请到并留下白玉山,让其加入队伍,官兵们费尽心思,历经曲折。包括在他的父亲与夫人面前做工作,后对他进行多方保护和重点照顾——这也是小说的中心情节。三是描写了胶东抗战的血火历史,揭露了侵略者的凶残。盘踞在

胶东的日军指挥官有大岛大佐和康川,伪军有张贵,以及地方土匪奸细,他们互相勾结,利用装备的优势和民间社会秩序的罅隙,清剿围堵,造成了对兵工厂生存发展的破坏,犯下对中国人民和无辜百姓们的滔天之罪。

作品的情节情节颇有新意,注重对底层人物和民间故事的描绘。抗战题材的小说众多,也不乏写兵工厂故事者,此类作品多是写民众力量的坚韧与深厚,写军人的赴汤蹈火、不辱使命,指挥官纵横捭阖、决策果敢。不同于此的是,《向日葵》选取了一个民间性的视角,从一支没有多少战斗力的工厂员工制造武器、发展实力的角度入手,从这一战争的配角和一个有特别技术与自由散漫的民间高人加入、并为兵工厂生存解决重要技术难题的传奇人物展开,写这支队伍和这类人物对抗战历史的影响,从侧面揭示了宏大历史的一个角。

白玉山形象为小说着笔重点,这一人物形象也丰富了抗战人物的画廊。他曾是一位船员,因精通冶炼和机械制造,成了技术奇缺的八路军和日军兵工厂同时寻找和依赖的人才。八路军兵工厂利用王木林的邻居关系先行一步,将他智取“绑架”入队,而日伪军也从其家庭后院进行利诱和威逼,当妻子遇害,八路军兵工厂上下对他的真诚感化,兵工厂中“借用”的国民党军人江南春的现身说法,激起了白玉山对日军的仇恨,唤醒了他们做人的良知和尊严。他冒着生命危险,购买材料,去国民党兵工厂“偷艺”,研制出了急需的枪炮,有力地支援了胶东抗日。小说书写了这样一个有着诸多不良习性的民间高人,成为义无反顾的抗日战士,包括与

他有亲密关系而混迹于烟花巷中的“小白菜”,利用与日军头子的关系为白玉山弄到物资批文,提供方便,而自己也跳入海边悬崖的故事。这些在民间层面上激发出的抗战卫国的精神力量,是从底层人士和民间视角进行的书写,有着特别的意义。

就整个抗战历史来说,民间的力量不可或缺,已为历史所证实。小说或许是从一个生活的真实事件出发,去书写这个艰苦的战争对于民族和大众的意义。民间化的书写不同于宏大叙事,尤其是对革命历史的展现和英雄人物的塑造,不一定是高大的身形展示、深邃的精神揭示,甚至结局也可能不知所终。也许,不乏琐屑的日常细节、不乏粗鄙的平淡情怀,却能映衬出真实质朴的生活原状,让读者更为切实地从小说艺术中获得源自生活的真实感受。

小说题名《向日葵》有些灵灵,一个壮烈的战争故事,却用一个美好的物质来反衬。小说在一场惨烈的牺牲场面中结束,白玉山为八路军制造了所急需的“牙山炮”、仿捷克步枪后,毅然决然地端着枪,家仇国恨,民族大义,人性尊严,种种合力,使他由一个散漫滑头的民间混混儿似的人物,成为一个战士,这也许诠释了题目寓意,人生前行有如“向日葵”似的精神意象,总有一种向心力量昭示和吸引。这是人性的复归,是生命尊严的推动,抑是一种向善力量的指引?无论如何,这可能成就了一个人和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兵工厂的人与事虽消失在历史尘埃中,但那慷慨牺牲、舍身取义、感动天地的精神气概,会随着这部小说的传扬,成为革命历史中特殊而值得珍视的篇章。

■短 评

■看小说

文珍《我们究竟谁对不起谁》戴着面具的“鬼”

在文珍的短篇新作《我们究竟谁对不起谁》(《山花》2014年第1期)中,几个都市的大龄剩女喊出了“我们一定要幸福”的宣言。然而,故事里却没有一个人真正幸福。都市男女都像没头苍蝇一样受困于自己无法克服的欲望和现实的种种冲突。顾安在父母的干涉下与家境不好的男友分手,嫁给了外在条件不俗的小黄。不料小黄原来是一名同性恋者。一次外出学习的机会,顾安结识了小黄的熟人李同,两人互生情愫。李同是个信仰坚定的穆斯林,顾安却是基督徒,在得知这一点后,不能喜欢“一个结了婚的异教徒”的内心律令,驱使李同对顾安撒了谎,声称自己是一名同性恋。他不知道这个谎言对顾安造成了致命的打击,导致她割腕自尽了。

尽管“同妻”现象由来已久,但是这一嶄新的命名标志着这一现象日益从暗处进入公众的视线,构成了一种新的城市经验书写。“世界上真是有鬼的,它戴的那个面具我很熟悉,叫做‘爱情’。”性取向、宗教信仰、个人隐私等等,区隔着人群,但这并非关键,关键是当代人与人之间的互不沟通与不谅解,冷漠、无视乃至于歧视,最终彼此倾轧,互相摧毁。

张怡微《不受欢迎的客人》人世的无情与有义

春丽和二婚丈夫何明一起经营一家小区照相馆,7年前,何明从贸易公司离职创业,然而,创办这间照相馆却只能勉强聊以糊口。一个步入夕阳的行业,一如他们步入夕阳的人生——光顾照相馆的客人也以老年人为主,这其中便有春丽所不欢迎的客人老贾,因为他是“那一种爱聊天、不做生意的闲客”。五六年来,他一年给一位客人做一本相册,做完了老婆、儿子、女儿,甚至还做了一本他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女士。“生活总是有很多秘密,何明经营这间不成功的照相馆以来最大的收获,便是知道了人的一生都会有很多不为人知的隐情。”有一天,老贾突发中风,弥留之际,何明夫妇找到医院,为他拍下了人生最后一张照片。在老贾过世后,何明夫妇将替他做的相册分送到交给他的家人及那位神秘女士手中,家人的反应相当冷漠,而那位女士却喃喃自语道:“我知道的,他除了欠我,谁都不欠。”

上海新生代作家张怡微在《不受欢迎的客人》(《上海文学》2014年第4期)这个不过万言的短篇小说中,以海派洞悉世情的精微笔法,塑造了一个“爱照片、爱家人、不逾矩”的男人,直指人情的冷与暖、人世的无情与有义。(晓 翔)

孙频《乱身》性别错置与命运悲剧

孙频的中篇小说《乱身》(《花城》2014年第2期)情节诡魅、基调阴郁。作者孙频通过陌生化的叙事策略和极端化的境遇设置,将两个身兼苟活于社会底层的孤独个体逼入生命的死角,从中萃取出人性中的善与恶、爱与恨、灵与肉、彷徨与决绝、懦弱与强悍。

从小被爷爷抚养长大的弃婴常英,一岁半那年因高烧双目失明。年迈的爷爷为了能让常英将来更好地独自生存,不仅为她改名常勇,并且试图阉割掉孙女身上一切女性特征:留短发、穿男人衣服、佩戴裹胸、站着小便……常年的性别“矫正”与人格扭曲使常英成为了县城里崭新而陌生的新人种——雌雄同体的阴阳人。“女人”成为了她与生俱来的“一种顽疾,一种羞耻,一种遥远而模糊的幻影”;而“男人”则是她面对公众的面具,也是她苟活于世的救命稻草。然而,常英体内与生俱来的女性特质远非粗暴的肉体规训所能彻底改造的。精心的藏匿某种意义上恰意味着更大的暴露,失去爷爷的常英内心深处渴望一场畅快淋漓的情欲宣泄。

在常英女扮男装独自表演性格悲剧的同时,另一处则正上演着杨德清的命运悲剧。杨德清是县城里有名的光棍汉,贫穷与饥渴使得血气方刚的他一次次地铤而走险:为了偷取食物,他像只老鼠一样蹑房檐、创地洞;为了释放性欲,他又像头牲口一般地随处发泄。长期的性压抑锻造了他敏锐的嗅觉,可以捕捉到常英男性外表下藏匿着的女性气息;然而,就在他彻底识破常英女儿身的时刻,却惊讶地发现自己已经丧失了性能力。一个是想做女人而不得,一个是欲做男人而不能,他们由于“在人群中丢失了性别,而成为了这个世界上真正的亲人”。为了弥补各自深入骨髓的身体缺陷和精神残疾,苦闷、乖戾的杨德清选择去充当迎神赛社上的马褂,通过“加倍的虚张声势的强硬去填补自己一个地方的软弱”;而抑郁、内敛的常英则选择在坍塌的精神家园实现灵魂的浴火涅槃。(赵振杰)

■短 评

城与人:思想交锋中凸现改革难度——读钱景林长篇小说《雷鸣时分》

□王纪人

上海的第二波改革开放热潮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初,至今不过20多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在文学上,上海的跨世纪现代性变化一直缺少表现,而更多地停留于怀旧。即使有所表现,也还是一鳞半爪式的,缺少大格局、大气象。钱景林的长篇小说《雷鸣时分》写的恰恰是近20年来这座城市的的巨大变化,作者用“临海市”指代上海,其中所写的重要事件几乎全是真实发生且是作者亲历过的,而人物则多是虚构。与上海多数作家仅为目击者不同,这部作品的作者钱景林直接在改革开放的第一线,他调动了丰富的生活积累和文学阅读的积累,意在笔先,布局谋篇,构造情节,设置冲突,塑造人物,成功地完成了处女作——长篇小说《雷鸣时分》。

作者选择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城市土地批租、旧区改造的重要事实构筑情节,以城市高层管理者的所作作为主要情节线,从一个重要侧面反映城市改革开放的全貌。主人公雷声上世纪90年代初担任市长,当时城市旧区亟待改造,却缺少改造的资金,如用集资改造旧房的方法,至少需要100年。于是,他决定加快始于80年代末的土地批租的步伐。所谓土地批租,就是把国家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开发商支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动迁居民后建房,到期土地收归国有。土地批租解决了城市旧区改造资金匮乏的困难,也改善了当地居民的住房条件,推动了城市的改造和建设,可以说是举几得的事情。但由于当时一些人的陈旧观念,也由于土地批租的复杂性以及动迁中存在的困难或弊端,这一政策曾引起激烈的争论,甚至被指责“搞新的洋人租界”。同时,大力推行土地批租,招商引资的市长雷声因此受到质疑和人身攻击,被斥为“批租市长”,以致惊动了上级领导,停止了土地批租。但雷声不改初衷,在澄清事实 and 一再陈情后得到上级和同级的理解,实施了规范化、法制化和宏观调控的政策。小说以此为情节主线,塑造了敢于探索、勇于实践、亲民为民的改革者形象。小说写雷声改变视察路线,突袭棚户区,以及亲自接待拆迁户上访者、解决民生疾苦的情节,尤其令人感动。

小说追叙了雷声在北大荒艰苦的知青生活以及他与老领导的忘年友情,为他坚毅果断、不计私利的品格作了铺垫。在刻画雷声这种性格的同时,也渲染了他性急冲动的一面。在私密关系上,他在与青梅竹马的肖丽娜重逢后,也曾产生遭遇红颜知己后难以克制的情感。而肖丽娜此时已有港商的身份,而雷声也有妻室,因此,这段关系成为别有用心者制造谣言的口实。小说这样来描写一段未曾酿成严重后果的情感波澜,并未损害这位改革者的形象,而是如实描绘了感情的复杂性和自律性,对情节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像雷声这样的改革者,以

及小说中有点保守却顾全大局、有力支持雷声的市委书记朱理栋等,代表了执政者中的正面力量和后备力量,他们才是使城市重新焕发青春并在未来可能有更大作为的健康力量。

相较于雷声,副市长顾刚的性格更为复杂。就能力和魄力而言,他不在雷声之下,而且在雷声眼里,他还是悟性高、办法多、关键时刻能够冲锋陷阵的得力干将。但有人有正邪两面,在野心和私心的驱使下,正不压邪,邪取代了正。由于他早就觊觎正职的位子,不惜纠集小兄弟们出谋划策,呼风唤雨,设置陷阱,造谣生事,并利用土地批租的复杂性一箭双雕,让雷声出纰漏,自己却从中牟利。而雷声却浑然不觉,毫无防范之心。顾刚的恶劣还表现在陪曹市长访港时,诱使他接受贵重礼品,在鼓励他接受异性按摩时又偷偷录像,还派狗崽队偷拍雷市长去肖丽娜住处的照片。这种卑鄙的行径暴露了他奸诈小人的一面。小说中顾刚是因受贿劣迹败露而被侦查判刑的,以他为主的情节副线反映了干部队伍腐败的一面以及人性的颓败与堕落。但作者在塑造这个人物时没有流于公式化、概念化,而是写出了一个有血有肉的形象。顾刚利用土地批租和分管城市建设的机会,私自进行违法乱纪的权力寻租,中饱私囊,严重损害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作者塑造这一形象具有相当的典型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腐败的严重性和反腐的紧迫性。

无所不谈 道在其中

——读陈社散文集《艰难的父爱》 □顾 农

好的青年人的友情和奋斗,后来在运动中却成了陈肖肖的罪状。正是因此,他的身体全垮了,缠绵病榻,终于英年早逝,让少年陈社只能感受所谓“艰难的父爱”。这样的痛苦在当年的中国虽然只能算是小事一桩,而在作者却是刻骨铭心的。此书中有一篇《母亲的教诲》,文字很平静,但我总是从中感受到灰色雾霾在压抑着她,让一位大家闺秀出身,才华横溢的知识女性从此异常低调,呈现为东方女性婉约深沉的美。

《关于耿庸》一文写得很沉静,只是说“没想到他还活着,狱中十多年活下来了,‘文革’十多年也活下来了。平反后,耿庸一头扎进了工作和写作,以其伤病之躯在上海辞书出版社编审的岗位上认真地为他人作嫁衣裳”,成了上海市劳动模范,还担任着全国政协委员等社会职务和学术职务”。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许多知识精英和他们的亲属子女吃尽了苦头,而后来却能如此宽宏豁达,认真工

作,甚至当上了劳动模范。在创作上当一个托尔斯泰大约不容易,而在思想上能做到他所主张的忍辱负重、自我完善,这样的人在中国似乎比比皆是,尽管在这里几乎完全没有俄罗斯传统知识分子那种宗教情结在起作用。《母亲的教诲》中记录的教诲之一是:“你要记住别人对你的好,不要记住别人对你的不好”,又一层意思道:“即便吃了亏,这个‘亏’也是身外之物,不值得计较。”这些话虽然普通,却是许多善良的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安身立命之道。

陈社的散文文无所不谈,《二叔的一生》写二叔这位离休老干部平凡而曲折的命运,粗看好像并无深文大意,但我注意到,文章中间写到了他被莫名其妙地打成右派后来又平了反,几十年中一向老实勤奋地工作,但“凡事都要辩个理的习惯并未有多少改变。每次回泰州或者通电话,都可以听到他的高谈阔论。他最主要的话题永远是国家大事和世界风云,

给厂长周海阔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说他家邻居的儿子叫白玉山,在烟台一艘船上做大副,此人精通冶炼和机械制造。厂长周海阔当即命令王木林,不惜一切代价把白玉山请进厂。王木林接受了任务,去动员白玉山到八路军兵工厂,被白玉山奚落一顿,说自己吃不了那份苦。此时驻扎在烟台的日军邀请白玉山担任日军兵工厂的技师,王木林担心日军抢先拐走白玉山,于是采用非常规手段,将白玉山打晕了,绑架到兵工厂。厂长周海阔如获至宝,像伺候爷爷一样供养着白玉山。为了让白玉山每天有鱼有肉吃,派王木林去水库摸鱼、去敌人封锁区搞肉食,还派厂里的女工槐花专门照顾他的生活。尽管如此,白玉山并不领情,总是寻找逃跑的机会。再后来,甚至吵嚷着要回烟台逛窑子。

不过白玉山确实身怀绝技,他稍稍动了一下脑子,就给兵工厂解决了很大的技术难题,这更让厂长周海阔坚定了改造白玉山的信念。

日军多次围剿八路军兵工厂,周海阔对白玉山采取特别保护措施。一次,周海阔陪同白玉山到八路军阵地上送武器,并利用实战的机会检验掷弹筒杀敌效果,没想到被日军包围了。危急时刻,周海阔指挥部队拼死保护白玉山,为此牺牲了将近一个排的战士。这种巨大的代价,让白玉山内心受到震撼。在周海阔和周围人的帮助下,白玉山一步步走上了革命道路,最终成长成为一名抗战英雄。为了制造大炮,白玉山冒着生命危险,一次次突破敌人封锁,购买急需的设备和原材料;为了解决技术难题,他去国民党兵工厂偷艺,并且把国军的一名技师请到了八路军兵工厂。在白玉山的带领下,兵工厂迅速发展壮大,制造出具有很大杀伤力的“牙山炮”以及仿捷克步枪,有力支援了胶东八路军抗日将士。

我欣赏能够写出哲学意义和人性亮光的小说,很显然,《向日葵》达不到这种高度。在这里,我只是写了一种民族精神,写了我们的军队和人民血浓于水的情感,写了像白玉山这样有良心和血性的中国人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引领下,始终向着阳光生长,最终完成了人生的转变。

在小说《雷鸣时分》中,虽然市委书记和市长都是廉洁自律的,但他们在最可能产生权力寻租和滋生腐败的土地批租中缺少警惕,没有严明纪律,没能严格管理和及时发现问题,而是过于相信、过于依赖自己的副手,应该说也负有一定的责任。小说虽然没有明确表现他们在这方面疏于管理的缺点,但也恰恰如实反映了一种由来已久的现状。

作为一个初学的文学写作者,钱景林一出手就写了一部反映国际大都市改革开放的长篇小说,表现了观念的冲突、思想的交锋和灵魂的搏斗,以及一场史无前例的城市改造攻坚战,成功塑造了几个城市高层执政者的生动形象,情节引人入胜,立意也颇高远。

《雷鸣时分》的出现还说明,文学创作需要有更加熟悉这个时代并有志于文学的人加入,他们的加入将使文学更具时代感。当然,文学与时代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论题,对于不同的作家来说也会因人而异,但不论距离的远近,都需要有关怀现实的精神和勇气。

长篇小说是一面多棱镜,《雷鸣时分》中如果能再多一些城市生活的侧面,对人生有更多的洞见,对城市的发展和建设有更多的反思,不满足于尽写已经发生的事,也写可能发生的来往,那就会更加出色。期待钱景林以更强的文学表现力和对生活的洞见完成他的上海三部曲,让我们进一步感受时代脉搏的有力跳动。

几十年如此。经常和他的弟弟、妹夫以至晚辈们辩得不可开交。有时我没有时间和他多聊,他还蛮有意见,说我缺乏我父亲那种忧国忧民的满腔热忱。”亏可以多吃,理不能不讲。这也是一条很重要的“道”。

《一面之缘》是为纪念突然病逝的首届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著名电视散文编导景国真而作。陈社同他只见过一次面,而景国真为了将陈社的《艰难的父爱》拍成电视散文前后来忙了两年,做了大量的工作,结果得了一个大奖,其时他已经离开了省电视台的编导岗位,此后同陈社也没有了什么直接的来往。他“为的什么呢”?陈社提出了这个问题却没有回答。我想这里面自然有一种“道”。

《我读浩泉》是陈社阅读泰州作家潘浩泉作品后的体会,其中有许多正面的评价、细致的分析,同时篇末还有一段直陈潘浩泉作品的“不如我意之处”,非常坦率,这些看法不是中肯我不敢确认,但我敢说,这正是文学批评的应有之义,同时也包含着一种“道”。陈社有一篇文章的题目写得好像:“坦然就不累”。

陈社的散文如行云流水,但似乎也还是有些未过我瘾之处,如果能更迂回、更锋利一些,或能多一点如杜甫所说的“沉郁顿挫”,可能更好些。

向着阳光生长

□衣向东